

郭松龄倒戈反奉事件初探

张 安 庆

郭松龄倒戈反奉事件曾经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怎样评价这次事件?历来众说纷纭:有人斥之为“犯上作乱”;有人誉之为“民族解放战争”;更多的人视其为“军阀混战”。本文拟通过对事件全过程的考察,初步探讨事件的性质,以就教于识者。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奉军第三方面军第十军军长郭松龄突然倒戈反奉率部进军沈阳,当时人们深感意外。郭松龄为何会有此举?这个问题,只能从事件发生的历史环境中去寻求答案,正如列宁曾经指出的:“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①

一九二四年一月形成的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推动了中国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发生在一九二五年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震撼全国,标志着革命新高潮的到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南方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北方人民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斗争蓬勃开展。

在封建军阀营垒中,经过一九二四年十月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张作霖为头目的奉系军阀成为全国最大的军阀集团,它与皖系段祺瑞相勾结,控制着北京的北洋军阀政府。奉系军阀是一个封建买办性的军事政治集团,其对内压迫掠夺,对外媚外卖国的反动政策,也随着奉军势力扩张至长江流域而施之于所到之处。横征暴敛,敲榨勒索,纵兵扰民,奸淫虏掠,真是无恶不作,辽、吉、黑、直、鲁、苏、皖诸省人民对奉军无不切齿痛恨。当“五卅”惨案发生,全国反帝怒潮汹涌,而奉系军阀却为虎作伥,到处帮助日英帝国主义疯狂镇压群众爱国运动,残杀爱国志士,封闭爱国团体,禁止一切集会,摧残人民自由,充当了帝国主义的帮凶和走狗。

奉系军阀的罪恶行径,激起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慨,反奉空气弥漫全国,“普遍而且深入一切民众中,从工人农民学生小商人以至一部分大资产阶级,几乎全体国民都站在反奉方面”,^②全国人民的斗争锋芒齐指奉系军阀,由反帝转而反奉的群众运动高潮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中国共产党是人民反奉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党通过《响导》周报发表了一系列声讨奉张的战斗檄文,提出以“武装平民,打倒奉天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建立平民的革命统一政府”,^③作为运动的总口号,号召人民:“万众一心,不断的奋起”,“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④在党的号召下,从上海、北京开始,各地相继举行“反奉倒段”群众大会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国民党左派和广州国民政府积极支持反奉运动。冯玉祥的国民军亦对运动表示同情。就是其他派系军阀,也因奉系扩张受到威胁,而利用人民群众的反奉气势,发动反奉战争,首先动手并给予奉军实际打击的是直系军阀浙江督军孙传芳,孙所统率的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不到一个月就把奉军驱出了苏、皖及上海。在全国人民反奉运动的打击下,奉系军阀成为众矢之的,陷于各种反奉势力的重重包围之中。

“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掌握着未来的阶级。”^⑤ 全国反奉运动的高涨，奉军之陷入困境，不可避免地在奉系军阀内部产生强烈反响，引起新的分化，郭松龄倒戈反奉就是这种分化的突出反映。

郭松龄，字茂辰，辽宁沈阳人，一八八二年出生于贫苦的塾师之家。早年加入同盟会，曾谒见孙中山，受到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素怀“改造东三省”之志。^⑥ 先后毕业于奉天陆军速成学堂和北京陆军大学。投身奉军后，任东三省讲武堂教官，当时正在讲武堂就读的张作霖之长子张学良，对郭的品学极为佩服。一九二〇年张学良从讲武堂毕业，任东三省巡阅使署卫队旅旅长，乃保荐郭任该旅参谋长兼第二团团长。此后，郭一直在张学良身边，辅佐其训练军队，带兵打仗，成为张学良的心腹，张常对人说：“我是郭松龄，郭松龄亦即是我。”^⑦ 由于治军有方，屡建战功，加之张学良的推荐，郭渐得张作霖的信任，委之以旅长、师长、付军长等职，成为奉军的重要将领。到一九二五年十月，更任之以正在编组中的奉军第三方面军第十军军长，因第三方面军军团长张学良不在军中，所辖第八军、第九军、第十军的编组都由郭主持，这样，奉军精锐尽在郭松龄掌握之中。

郭松龄在奉军中的声望和地位日益提高，遭到奉系军阀内部其他派系的嫉妒和不满。奉系军阀素有老派、新派之分。老派以张作相、张景惠、吴俊陞等为骨干。新派中又分为士官派（洋派）和大学派（土派），前者以出身日本士官学校的杨宇霆、姜登选为中坚，后者以毕业于北京陆军大学和保定军官学校的郭松龄、李景林为领袖。各派之间，“互相倾轧，由来已久”，^⑧ 张作霖正是利用这种矛盾来统驭各派势力，使自己成为奉系军阀的首领。郭松龄见信于张作霖，使老派不满，更遭到士官派的妒嫉，特别是杨宇霆等人，常常“谗于张作霖”，^⑨ 多赖张学良庇护，才得免于被排挤。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因战斗部署和撤换军官事，郭松龄与姜登选、韩麟春意见分歧，公开争吵，甚至达到使郭率部退出战场的地步，虽经张学良驰马追回，但郭与姜、韩的矛盾因而表面化。战争以奉系获胜告终，战争中郭松龄战功卓著，论功行赏，张作霖曾许郭以安徽督办，后为杨宇霆所阻，改任姜登选督皖。^⑩ 这样，奉军入关后杨宇霆、姜登选、张宗昌、李景林皆得到一省地盘，独郭“功高不赏”一无所得，这不能不使郭对张、杨集团深为不满，更加深了郭与士官派的矛盾。

民主主义的思想基础，手握重兵的有利条件，奉系内部矛盾的深化，都是促使郭松龄倒戈反奉的动因，然而，在全国人民反奉运动大潮的推动和影响下，奉军内部以郭松龄为代表的部分军官，不满和反对张作霖、杨宇霆集团穷兵黩武、祸国殃民的倒行逆施，则是事件发生的最根本的原因。“郭松龄的倒戈，显然是受民众的国民运动的影响”，^⑪ 这一点在郭松龄倒戈反奉的酝酿与准备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清楚。

一九二五年十月，郭松龄奉命作为奉军代表应邀赴日本参观“秋操”（日本陆军大演习）。当时，张作霖为扩大内战，实现武力统一的迷梦，正派其日本顾问松井七夫来日乞讨救兵，并即将派代表来日与日方签订卖国密约，以承认“二十一条”为条件，由日方供给奉军军火去进攻国民军。当郭松龄在日本察悉此事内幕时，感到无比义愤，当即毅然把密约的全部条文告知来日本观操的国民军代表韩复榘，并愤慨地说：“国家危殆到今天这个地步，张作霖还不惜为个人出卖国家。他这种干法，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苟同的。我是国家的军人，不是某一个私人的走狗，他若真打国民军，我就打他。”^⑫ 表明他准备用武力反对张作霖的卖国、内战政策。原来他打算参观完“秋操”后，继续逗留日本，以研究日本军事，甚至准备进日本军校深造，但当他在仙台演习的地方得知孙传芳进攻，奉军在江南惨败的消息时，预感到国内形

势将发生重大变化，武力反奉的时机已经到来，于是立即返国，准备举事。

回到沈阳，郭接受了代表张学良编组第三方面军的任务后，即来天津，称病住进意大利医院，暗作反奉准备。为了掌握反奉实力，郭在编组中对人事抓得很紧，他从张学良那里要来了自己的亲信，炮兵旅长魏益三，任为第十军参谋长，为之出谋划策，调兵遣将。不仅亲自挑选高级军官，就是三个军的卫队营营长人选都要经他决定。为了使部将对武装反奉有思想准备，他利用各种场合，宣传反对奉军打内战的观点。他曾经向魏益三表示：“我主张巩固国防，开发东北，最反对为少数人去争督军。试想，这样谁受害，还不是东北人民吗！”^⑬在住院期间的一个晚上，郭在天津国民饭店举行集会，当场讲述他不满奉天方面的所作所为，极力主张“不应为争夺关内地盘替少数人谋求地位，使广大东北人民遭殃”。讲话时“悲愤激昂，以致痛哭流涕”。^⑭为了争取同盟者，避免腹背受敌，郭松龄联合李景林，并与冯玉祥签订了反奉密约。密约共七条，主要内容为：排除军阀专横，永远消灭战祸；实行民主政治，改善劳工生活；实行强迫普及教育；开发边境，保存国土；反对内战以及为打内战而订立卖国条约、借外债、引用外国兵力残杀本国同胞。并具体规定：冯方诚意赞助郭方开发东三省，改造东三省政府，并牵制反对方面；郭方诚意赞助冯方开发西北，必要时亦以实力援助之；直隶、热河均归李景林治理，但保定、大名以及京汉线冯军可随意驻扎，天津海口冯军可自由出入。^⑮直督李景林与郭松龄同属大学派，交谊甚笃，为保有直隶地盘，李亦主和反战，与郭的主张不谋而合，在郭、冯密约协商过程中，郭松龄借冯玉祥的代表熊斌曾到直隶督署与李景林会商联合反奉事宜，李表示由于老母在奉恐被杀害不能在密约上签字，但赞成共同行动。^⑯于是形成了时人所说的反奉三角同盟。

正当郭松龄暗中积极准备武力反奉的时候，张作霖在杨宇霆等人怂恿下，一再要郭松龄、李景林对国民军用兵，郭、李力主和平，坚不从命，张作霖莫可奈何，只得与国民军暂谋妥协，并于十一月十六日签订了和平协定。但是，到十八日，国民二军邓宝珊部与奉军李景林部因保定移防发生冲突，张作霖迁怒于郭松龄、李景林，来电“严加斥责”，并命令“克日夺回保定，以赎前愆”。^⑰二十二日张作霖突然电召郭回沈阳一行，张学良也劝他回沈阳当面陈述自己的意见。郭松龄断定他的暗中活动已被张氏父子察觉，召他回沈阳一定不怀好意，当即下定“提前行动”的决心。当天，郭对张学良说：“上将军脑筋太旧，受群小包围，恐已无可挽救”，他建议“父让子继”，由张学良接任东北最高首脑，改革东三省局面，他竭诚拥护。张学良骤听此言，“不禁骇然”，但未动声色，潜行搭北宁路火车东返。^⑱是日深夜，郭松龄发出班师回奉主和罢战的通电，要张作霖下野，推张学良继承大任，历数杨宇霆罪状，要求将其“即日免职”，并声言国内应即日停止军事行动。^⑲

十一月二十三日晨，郭松龄离开医院率司令部人员和卫队乘火车东行至滦州（今滦县），当即在车站附近一个火柴公司楼上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师、旅、团长和高级幕僚三、四十人。^⑳会上，郭宣布班师通电后，即席发表演说，大意是：反对张、杨集团“争夺地盘，贻害东北人民”，主张“巩固国防开发东北”。^㉑与会者大多赞同郭的主张和行动，并在事先准备好的花名册上签了名。唯有与老派有密切关系的师长赵恩臻、高维岳、齐恩铭、斐春生等表示犹豫，不愿列名，郭随即将他们解职软禁，派人护送到天津，交李景林看管。正在这时候，姜登选乘专车返奉途经滦州，当即被郭扣留，因姜反对起事，于二十六日被枪决。

在离开天津前，郭就指示参谋长魏益三组织在天津周围的部队向东开拔。滦州会议后，郭将所部七万人组编为四个军，并制订了进军计划：以刘振东为第一军军长，率部直趋沈阳；以刘伟为第二军军长，与山海关附近的张作相部（第五方面军）周旋，先谋妥协，不成则以武

力解决；以范浦江为第三军军长，率部趋热河，先劝阎朝玺合作，不成亦决予一战；以霁云为第四军军长，作总预备队，策应各方作战。^②郭军起事后，仍然以张学良的名义号令全军，这既表明郭鉴于张学良在思想上与其父有所不同而对他抱有幻想，同时也是为了减少阻力便于进军。

二十五日，郭任魏益三为第五军军长，作进军先锋，率两个团和一个工兵营乘火车向东潜行，打算乘其不备，占领山海关。同时，又派张作相之子魏部团长张挺枢去山海关争取其父合作。但当魏军一部通过山海关，到达万家屯构筑工事，另一部到达山海关时，由于张挺枢和从滦州跑来的齐恩铭之子齐家桢、赵恩臻的副官孙某等告密，山海关驻军已有所准备，致使魏军遭到伏击，除少数逃脱外，大部被缴械。为了击破敌人的阻截，郭亲率主力出动。面对强大的郭军主力部队，张作相部自知无法抵抗，遂急速撤军关外。于是郭军二十六日占领秦皇岛，二十七日冲过山海关，二十九日进占绥中。

郭松龄滦州发难后，二十五日，冯玉祥、李景林宣布“中立”，并分别发出通电，敦促张作霖下野。冯在通电中历数张作霖穷兵黩武兴兵扰民、为虎作伥镇压群众的种种罪行，大骂张有帝王思想，横行霸道，向他指出：“现在举国救亡，集矢一身，自宜引咎自责，以谢国人”，要求张“及时引退”，“以三省政权完全还之国民”。^③在发出通电的同时，冯在军事上作了部署，命张之江部进驻丰台至落堡一线，宋哲元部集结多伦并向热河动员，冯本人也于二十六日返回张家口，以便应付事变。^④李景林的通电虽然也指责张作霖“好争喜战”，但言词甚为委婉，重申其主和罢兵的主张，劝张“庶政付诸少帅，藉息仔肩，以娱天年”，^⑤这就为他后来失约留下了退路。不久，由于种种矛盾和误会，李景林部与国民军大打出手，这样，不仅冯玉祥没有出兵助郭，且使李景林重新投入奉张的怀抱，拖起郭的后腿来。因此，所谓反奉三角同盟，事实上并未实现。

面对郭松龄倒戈，张作霖十分惊慌，起初想用“安抚”即欺骗的办法来平息郭松龄，制止事态的发展。他一方面立即免去杨宇霆的总参议职务，让其离开大帅府，暂时躲避，以消除郭松龄倒戈的口实；另一方面派张学良去面见郭松龄，劝其息兵。二十六日，张学良带秘书朱光沐、参谋姜化南等由葫芦岛乘镇海号炮舰赴秦皇岛，同行的还有日籍顾问。舰到秦皇岛，张学良住在舰内，电邀郭松龄面谈，遭郭拒绝，^⑥乃委派日籍顾问代往达意，郭表示“非彻底解决奉局，贯彻其主张不罢手”，^⑦并有长信致张学良，详细申述其举事的原因，表示其贯彻初衷的决心，并劝张“导亲以义”，反其父之道而行之。张学良没有达到目的，“意态索然”，于二十七日晨离秦皇岛海面途经大连返回沈阳。

“安抚”失败，张作霖露出凶残本相，三十日发表“讨伐”郭松龄宣言，说郭与左派提携，欲使中国赤化，^⑧并悬赏八十万元以换取郭的头颅。同时，命令张学良、张作相集结从山海关撤退下来的军队在连山（即锦西）至塔山一线布防，阻击郭军。

郭松龄不受欺骗不怕威吓，于三十日发出通电，改称所部为东北国民军，^⑨不再用张学良的名义发号施令，表示与奉张集团彻底决裂。并在进占绥中、兴城后，率部乘胜进击，十二月三日郭军前锋即与防守连山的奉军接触，经过两天激战，摧垮了奉军的防线，取得了“连山战役”的巨大胜利，郭军于五日攻占连山，六日占领锦州，七日前锋已渡过大凌河进至沟帮子。

奉军连山溃败的消息传来，沈阳大震，城内一片混乱，商店停业，人心惶惶。文武官员纷纷逃往日本附属地躲避，一些省议员暗中拉拢与郭亲近者作为未来进身的阶梯。^⑩群众团体已准备迎接郭军进城。甚至日本总领事吉田茂也几乎通知郭松龄，“让奉天和平移交，待准备

完成后，等候我的消息通知入城。”^{③①}张作霖更是恐慌万状，坐卧不宁，他预感到末日来临，于是将家眷安置到日本附属地躲避，把历年搜刮聚敛的大批贵重财物运往满铁仓库存放，自己也准备下野，逃往大连避难，甚至连下野的通电也起草好了，只待动身时拍发。^{③②}奉系军阀的反动统治眼看已摇摇欲堕了。

然而，日本帝国主义的干涉，却阻滞了郭军的前进，使奉张集团得以起死回生。

郭松龄滦州发难，自视为奉系主子的日本大为震惊，它表面上打着“不干涉主义”、“严守中立”的幌子，实际上由于深感这一出自奉军内部的事件，必将严重影响其在满蒙的“特殊权益”的保持和扩展，因而从一开始就以“保护侨民”为名积极进行干预了。起初日本对郭松龄抱有幻想，因而采取了对郭、张双方都进行拉拢和要挟的“骑墙”策略，这样，无论那一方取胜它都可以坐收渔人之利。

从十一月底到十二月初，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曾多次派代表面见郭松龄，提出只要郭应允“承认以前奉张在满州与日本订立之一切条约”，“保护日本在满州之一切权利”，“将来在满州境内不准有左派政党之活动”，^{③③}“割让金复海盖亦即辽东半岛”，^{③④}“将关东州的界线向北扩展到辽阳县”^{③⑤}等条件，日本便以实力助郭，将张作霖驱出沈阳，但此事遭郭拒绝，日方代表不得不“愤然离去”。^{③⑥}

与此同时，日本对张作霖的拉拢和要挟则迅即得手。以日本作靠山的张作霖，早在十一月二十五日就派杨宇霆前往大连，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暗中勾结。当郭军占领锦州，张作霖准备下野逃往大连时，关东军司令部派参谋长斋藤前来沈阳，张作霖偕日本顾问町野武马亲往与之谈判，正在绝望中的张作霖，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日本的援助上，只要能保住他的地位，日本的任何要求都是可以接受的。于是日张勾结一拍即合，当即签订了一项卖国密约。密约的主要内容为：张作霖“承认二十一条，并允将来张氏势力所及之地一切铁路、矿产、森林、电气等事业皆中日合办”，^{③⑦}“承认日本人在满州享有土地商租权和杂居权，在东边道、洮昌道等重要城镇设置日本领事馆”。^{③⑧}日本则以实力助张反郭，日本关东军向郭军发出警告，限制郭军行动，日本派兵保护张作霖，维持奉天省城治安，在日本租界及铁路附属地为张作霖等要人提供避难场所，^{③⑨}在必要时，日本“出兵四万助张，日兵待遇及薪金等事，一如中国营长，有死亡者每人给予恤金一万元”。^{④①}取得日本支持的张作霖，立即改变准备下野逃跑的初衷，决心“破釜沉舟”，与郭军周旋到底。^{④②}

日本的侵略要求得到满足，于是彻底撕下“严守中立”的伪装，全力支持张作霖反对郭军。十二月八日，日本内阁作出决议：令关东军司令官“速施警告，将驻屯军，作适当配置”。^{④③}同日，关东军即发出“警告”，蛮横无理地声称，由于“在满州方面……帝国在该地区之权利、利益，颇为重大”，因此，在南满铁路附属地带及其附近地区，“因战斗或骚乱之故，致使此重大之帝国权利、利益，有招至损毁及危害之虞时，在军人之职责上，不能默视……本司令官当然不得不采取必要之措施”。^{④④}在十五日的第二次“警告”中，更明确限定“南满铁路附属地两侧及由该路终点起廿华里以内”，“禁止两军直接战斗动作”及“军事行动”。^{④⑤}“警告”是分别送交郭、张两军的，貌似“公允”，实则在当时两军攻守异势的情况下，“警告”完全是为了阻止郭军前进，保护奉张集团不受攻击。接着，日本调兵遣将，实施武力威胁。九日，日军第十师团司令部由辽阳移驻沈阳，并将该师团所属第六十三步兵联队，旅顺炮兵一队，公主岭骑兵一队，以及附近的守备队调进沈阳。^{④⑥}十五日，日本内阁公然作出增兵满州的决定：从朝鲜龙山调二十四师团一部，从日本国内久留米等地调十二师团一部，组成以斋藤义夫少将为总指挥官的“满州派遣队”，开赴沈阳。^{④⑦}

郭军进占沟帮子后,原来计划分兵两路,主力继续沿京奉路东进,直取沈阳,另派一支队南下,取道营口绕击沈阳,对奉军造成两面夹攻之势。但当郭军旅长马恭诚率右翼支队一个团十三日进抵营口河北车站,正拟渡河开往南站进入市区时,不料竟遭日本独立守备队第三大队长安河内勇无理阻截。^④日本驻营口领事一面对郭军宣读关东军“通谍”,一面威胁说:“你们不要以为此间只有鲍英才一个营(鲍为奉军——引者),我们日军在南满有两个师团,在朝鲜有两个师团,随时都能开到”。^⑤郭松龄虽通过外交途径多次与日方交涉,仍无结果,郭军为避免与日军的直接冲突没有强行通过,致使两路夹击奉军的计划未能实现。另一方面,郭军主力由于要等待对日交涉的结果,又要克服气候酷寒和铁路、桥梁遭奉军破坏所造成的困难,因而进军迟缓,十三日进占白旗堡,二十一日才进抵新民,到达巨流河西岸,与奉军隔河对峙。

这时,奉张集团已争取到十多天的喘息时间,在这期间,张作霖利用日本提供的南满铁路迅速将吉、黑两省援军调到沈阳附近,又搜集辽宁全省警察、保甲团、护路军警等兵力以及从辽西败退下来的残兵,加上叛郭来投的少数部队,共拼凑了六万余人,自任总司令,设司令部于兴隆店,以杨宇霆为总参谋长,张学良为中路军司令,张作相为右翼军司令,吴俊陞为左翼军司令,制订了“中央坚守,两翼出击”^⑥的作战计划,沿巨流河一线构筑工事,摆开与郭军作最后决战的阵势。日本不仅为奉军提供大笔军费,补充了大量武器弹药,还派出军官在各军中充当顾问,派兵乔装混在奉军中,派间谍大肆活动,为奉张刺探军情。日本军事顾问林大八中佐就曾亲到前线,“为奉军布置炮兵阵地”^⑦,帮助奉军作战。据当时报纸揭露:“日本出一师团之陆军和百门大炮加入奉军防线。凡巨流河、兴隆店、塔湾一带,无处不有日本兵。”^⑧奉军以逸待劳,又有日军直接参加作战,因而在军事上占有明显的优势。

进抵巨流河西岸的郭军,设司令部于新民城,所部按一、二、三、四军的序列从北向南沿巨流河排开,于二十二日深夜对奉军阵地发起总攻击。这时的郭军,经过长途跋涉,官兵过于疲劳,天寒衣单,冻伤和患病的很多,不仅无兵源补充,且要分兵回驻山海关防御李景林,因而直接参加总攻击的兵力不足五万人,而且不少士兵听信奉张所谓“吃张家饭,不打张家人”的蛊惑宣传,士气颇受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郭军的进攻,开始虽有所进展,但不久就陷入被动。奉军根据日本提供的情报,从两翼反击郭军薄弱部分,并迂回到郭军后方,截断其后路,焚毁其粮秣弹械,加之日张联合出动飞机对郭军阵地狂轰滥炸,日本炮兵猛轰郭军驻地,郭军士兵被炸得“身首异处、血肉横飞”,^⑨于是郭军阵脚渐乱,陷入奉军三面包围之中,导致大败。

二十四日晨,郭松龄见大势已去,即偕夫人及少数随从,在部分卫队的护送下,乘民间大车向营口方向走去。日本驻新民领事侦知其去向,告知奉军尾追。当郭行至辽中县苏家窝棚附近,被穆春师王永清骑兵旅追上,从民家菜窖中逮捕了郭氏夫妇,并立即送往老达房师部。张作霖曾电令将郭解至沈阳受审,二十五日又下令将郭氏夫妇就地枪杀。

郭松龄倒戈反奉功败垂成,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他政治上与敌人斗争不力,策略上不善于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个人器质上自以为是,刚愎自用,不采纳部将的正确建议,以及李景林违约助奉,冯玉祥援助不力等等,但是最主要的原因则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出兵干涉,正如当时党的机关刊物《响导》正确指出的:“郭松龄之败,非败于张作霖,乃败于日本帝国主义。”^⑩

郭松龄倒戈反奉事件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它的历史意义是不容抹煞的。这次事件,从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沉重打击和严重削弱了当时中国最大最凶残的军阀集团——奉系军阀,

奉系首领张作霖的卖国贼咀脸进一步暴露，奉系各派势力之间的矛盾更加深化，奉军实力大大削弱，奉张集团财政愈加困难，金融危机日益严重，从此，奉系军阀从其发展的巅峰跌落下来，开始走下坡路，后来它虽然还能逞凶于一时，但只是回光返照垂死挣扎而已。这次事件也彻底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狼子野心，使中国人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帝国主义是封建军阀的靠山，封建军阀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对封建军阀必须同时反对帝国主义，从而把全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反日反奉运动的新高潮。

综观事件的前因后果及其发展过程，不难看出，郭松龄倒戈反奉决非偶然，它是在当时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运动高涨的形势下，受全国人民反奉运动的影响和推动而发生的，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发动倒戈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反对奉张集团的内战、卖国政策，具有明显的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倾向，客观上是全国人民反奉运动的组成部分。这次事件沉重打击了反动腐朽的奉系军阀，彻底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推动了全国反日反奉运动的开展，其进步性是毋庸置疑的，它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因此，我们决不能因为郭松龄曾经列身奉系，或者因为奉系内部矛盾是促使其倒戈的动因之一，就把这次事件同当时以争城掠池为目的祸国殃民的军阀混战等同起来。至于所谓“犯上作乱”，则完全是站在奉系军阀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立场上所进行的污蔑攻击，更是不屑置驳了。

郭松龄夫妇兵败被杀后，时人叹曰：“留待千秋论功罪，难得红颜共死生”。现在，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郭松龄倒戈反奉事件作出客观、公正、实事求是评价的时候了。

注释：

-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512页。
- ②③④③④⑤③ 《响导》周报，汇刊第三集，第1223、1255、1200、1307—1308、1264、1273页。
-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1页。
- ⑥ 郭任生：《郭松龄事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存稿。
- 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 《晨报》，1925年11月26日、27日、29日、12月19日、11、16日。
- ⑧⑨ 杨家駱：《民国名人图鉴》，卷二，第91—92页。
- ⑩ 杨蔚云等：《关于东北军郭松龄倒戈的回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存稿。
- ⑪ 瞿秋白：《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载《新青年》第3号。
- ⑫ 冯玉祥：《我的生活》，第434—435页。
- 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 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五辑，第120、122、123、126、173、174、159、163、146页。
- ⑮ 高兴亚：《国民军革命史初稿》。
- ⑯ 张同礼：《李景林督直及附蒋经过》。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六集，第106—107页。
- ⑰ 赵毅：《郭松龄的崛起》。全国文史资料存稿。
- ⑲ 姜文明：《郭松龄反奉的片断回忆》。辽宁省政协文史资料存稿。
- ⑳ 孙 曜编：《中华民国史料》，第176—177页。
- ㉑㉒ 《顺天时报》，1925年11月30日、12月2日。
- ㉓ 周大文：《郭松龄反奉时张氏乔梓点滴》。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存稿。
- ㉔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十一辑，第207页。
- ㉕④③ 〔日〕东亚同文会编：《对华回忆录》，第388、389、390页。
- ㉖ 刘焕文：《张作霖处理郭松龄反奉事件的经过》。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第61—62页。
- ㉗㉘ 罗靖寰：《我所知道的张作霖的对日外交》。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第29—30页。
- ㉙④⑤ 《民国日报》，1925年12月20日、21日。
- ㉚ 《盛京时报》，1925年12月10日。
- ㉛ 陶尚铭、关根勤：《张作霖与他的日本顾问》。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一辑，第185页。
- ㉜ 〔日〕草柳大藏：《满铁调查部内幕》，第235页。